

#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

——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周孜正<sup>1</sup>,周玉奇<sup>2</sup>

(1.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中国 上海 200241; 2. 盐城市图书馆, 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关键词:**盐城;士绅文人;废科举;倡新学;地方变革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1-0001-05

晚清垂暮,甲午战败,庚子之变,内忧外患之下,清廷不得不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变革,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其中之一。此举使得士子文人绵亘千年的晋身之途就此中断,加剧了社会变革和清廷灭亡。废科举十年后,盐城士绅廖鸿仪曾写下“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之诗句!那么,究竟废科举对士绅文人的命运有如何的影响呢,他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还清帝,自啸歌”呢?本文试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对该县废科举前后的历史境况进行管窥和复原,回顾和介绍他们在此期间的人生抉择和心路演化。

## 一、废科举(1905年)前盐城县社会状况及士绅文人

晚清中国社会动荡,但对闭塞偏僻的海滨小城盐城而言,“溯自嘉靖己未(1559年)倭寇蹂躏后,不罹锋镝之祸者已三百余年矣”<sup>[1]</sup>。长久的承平为盐城的人文昌盛创造了外部环境。盐城虽其地处苏北,却崇文重教。尤其是清中后期,科举发达,读书做官成为盐城文人的主流理想。地理位置和人口迁移使得盐城文化成为徐汉文化和吴文化两种文化模式冲撞磨合的产物,具有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特质。从区域分布看,盐城地处于徐州、淮阴为中心的徐汉“雄豪”文化的辐射区,民众性格豪放,喜饮本地的烈性白酒“五醒浆”,有“一瓢长醉”的豪气<sup>[2]</sup>。近代遍及盐淮乡村的香

火戏唱腔高亢嘹亮,昂扬激越,刚劲质朴,有强烈的徐汉文化风格;受人口迁移的影响,自晋代到明清,苏松嘉地区不断有大批民众迁至盐城成为灶民。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人口躲避战事,再迁盐城。大批江南移民给盐城文化注入了不同于苏北其他城市的文化特性;就地理环境而言,盐城多为冲积平原,境内河渠纵横,类似于江南水乡。以至于今天大丰、东台(原均属盐城县)沿海地带至今还存在一个吴语特征带。这都让盐城文化能逐渐融合江南文化并自我成长,自清中叶以后,江南文化影响更甚,特别表现在重视教育文化上,向学重教、读书入仕之风甚浓,与江南地区极为相似,明清两代进士数目虽不及江南,却远高于徐州等地区,在长江以北仅次于人文昌盛的扬州,但按人口比例计算则名列江北第一。正是这一历史环境,使盐城县成为近代苏北诸县中文化发达、社会稳定、士绅文人的荟萃之地。

盐城虽古称淮安富邑,但自明以来水旱灾害频繁,常常是“大雨大灾,无雨旱灾”,以至“四境流民,麇集城内,城头隙地,栖止殆满,嗷嗷待哺”<sup>[3]</sup>。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使得清末民初盐城士绅文人关注民生,更具忧民之思,并积极参与赈灾施粥、兴修水利等社会公益事业。应该说,近代盐城士绅文人群体在社会起着良好的中和剂的作用,由于他们的努力,盐城社会能够一直处于安定平稳状态。废科举以前,盐城的政治经济均很

收稿日期:2009-07-16

作者简介:周孜正(1974-),男,江苏盐城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少受到外界冲击,社会结构从未发生重大变革,连邮政局也迟至 1903 年才由外地人创办,且只办理民间信件与包裹,不代发报刊。盐城也没有自办的报刊,本地人去外地所见成为新消息的有限来源。由此,常态下的盐城士绅文人生活安逸,思想保守。太久的平静,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朱涛的《醉太平》所写“帘飘翠旌,琴调素心,墨池波影粼粼,写芳菊数茎”<sup>[4]</sup>,波澜不惊,优雅闲适。

甲午惨败、庚子赔款等还是在部分士绅文人中引起震动,盐城尚志书院主讲陈玉澍深感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可谓是“莠民踰伏于内,岛夷虎视于外”,警告盐城士绅文人们“小休小安,难可深恃,”并劝他们不要消沉,“人事修则天灾可弥”<sup>[1]</sup>,了解并跟上时代,改变盐城的落后风气。不少士绅在甲午之后“望风振奋”,成立具有革新性质的士绅社团“舒趾社”,结社是他们开始参与社会变革的首个信号。

废除科举前后,本地士绅出来经商办厂者极少,他们仍恪守传统的读书求发展之道,没有关心经济,也从未向绅商转型,这是盐城社会清末民初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 二、盐城士绅对废科举的反应与办新学的思考

科举被废、清廷灭亡“从根本上推倒了士绅阶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砥柱”<sup>[5]</sup>,尤其前者使得以读书求功名的仕途从此不再。经济上虽无重要进步,但对于危及自身废科举,士绅文人还是有相当强烈的反应。面对这千古之变,他们反应不一。

盐城士绅对于废除科举基本持认同态度,称其为“因应时势,不得不改”之举。早在 1901 年 6 月清廷复开经济特科时,陈玉澍认为“专以言语取士”的科举实质上已是“体用俱废,名实相乖”<sup>[7]</sup>,实该加以调整。废科举后,时任湖州乌镇同知的盐城人孙海南认为,“科举时代缚束聪明才智之士,停而罢之,诚为当务之急。”<sup>[7]</sup>然而,士绅赵毅庵虽然赞同废科举,但认为是世界大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停科举与各国同”,是“非科举之弊,乃时势之变也!”<sup>[8]</sup>显然,盐城士绅对此的思考有相当的差异。废科举后,盐城士绅认为新旧二学不能完全划清界限,新学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孙海南直言新旧二学各有所长,不可“尽弃中国之学而学外国之学也”。如“初等

小学逐词逐句讲明,比以前训蒙乡塾较为有益”,但高等以上学校仅设一门“修身”课而“尽将圣贤经传子史等书束置高阁”,此举是“不切实讲求”<sup>[9]</sup>。孙还对“国家奖励学生出洋游学”政策提出了现实拷问。他既质疑清廷的用人政策,留学归国的学生们“无问文义通顺与否,(即)加以举人进士名目”,用他们来做知县或小京官是现实之举么?又顾虑到留学生一旦“习染外国风气”,回国“必酿成革命之祸”<sup>[10]1-2</sup>,那就有违朝廷的初衷了。留恋旧学、质疑新学是当时盐城士绅较为普遍的想法,变革与保守是他们的重要思想特征。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也从未有人提出彻底抛弃旧学。

士绅陈玉澍倡导以“中体西用”来办新学。他在自著的《教育宣言》中认为清廷的“普立学堂,敬教劝学”是一大进步,但新学有“十难不可不恤”,如课程设置分散,“书亦杂糅,始基既坏,终成危垣”<sup>[10]6</sup>。与“倡新学”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观点不同的是,陈玉澍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是人心涣散,不能完全归咎于未学西学,故新学的基本目的应是“人人自治其身”;首要任务是“正人心、讲忠孝、惩贫躁、尽师道”<sup>[10]6</sup>。若学生不讲忠孝,根本谈不上将来为国出力。陈氏剖析日人作战时能“举国同仇敌忾”根源,认为是日本重视对儿童的伦理教育,“取古来忠臣孝子烈士,绘之为图,编之为歌,以发其慷慨激昂之气。”<sup>[10]3</sup>因此,新学教育学生应“莫先于讲义利之辩”<sup>[10]6</sup>。盐城“深通佛礼”士绅郭介梅居士与陈持此相同观点,他从“救世大悲之念”的理念出发,认为“吾华四千年立国之大本”乃中国之“伦常礼教,精神文化”,“维持礼教,即所以维持国家。”<sup>[11]</sup>

科举已废,是否都应该紧跟时代,改学新学呢?孙海南反对儿子“入宏文约翰学堂学习外国语”,要其“守拙闭门,最为安稳,脚踏实地,勿骛虚名”。孙认为学新学是“趋合时好、徒慕虚荣”,还不是必然趋势,不如在传统与新学间找一个“切实”点,建设实业学校培养人才,使“子孙有业可营,门户可永保。”<sup>[9]</sup>

综观陈玉澍、孙海南等盐城士绅对于由“倡新学”带来的教育改革的思考,虽有一些延续传统的偏颇固执之处,但也显示了这“千年一变”所引发的异常复杂的社会反应。这些经历过世事磨炼的士绅对新式教育的看法,是面对当时动荡不堪、人心不古的晚清社会的现实思索,是代表了当

时盐城社会的主流意见。当然不同背景的十绅文人对新学的接受程度不一,其看法既有统一性,也有多样性,这也从侧面折射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

### 三、废科举后盐士绅文人的命运选择

盐城士绅文人面对科举被废和清廷覆灭这些巨大社会变革,在对前途与命运进行重新选择时,一般从自身实际境况来做出相应的选择,其中年龄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下面就老中青三代士绅的选择分别加以叙述。

#### (一)“托足苟安新世界”的老年士绅文人

在家休养的老年士绅们倾向于保守的命运选择。虽然废科举、改国体后他们非常留恋旧体制、旧文化,但往往只有哀叹之力,无挽救之术。如曾授修职佐郎的廖砚香,告老还乡后,做事遵循孔孟垂训“非礼勿动”,且“频年除夕前”将铜钱“昏夜散于邻里之贫老者”。面对辛亥剧变,时年76岁的他“绝粒数日,痛欲仰药,谓吾已沾圣清雨露,国亡与亡……何独惜一死耶?”只能“托足苟安新世界,伤心犹念旧君王。”<sup>[12]</sup>廖氏的无奈感慨与伤心失落,典型地代表了一部分盐城老年士绅文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人生境况。

民国成立后,士绅不再按原有名分享受的政治特权,老士绅李保堂感慨:“所有出身、新旧籍概已束高阁,断烂零落不可知。”虽知时代大势是“新学绵延,科举终不复”,但老士绅仍很重视续修曾记录他们特殊身份、“断断不可废”的《射水芹香集》,这是他们“见之而心喜,与人言而以为荣”的资本,一旦“集废则人没,是没其祖父兄矣”<sup>[13]</sup>。

老年士绅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衣冠仍旧制”,热衷于保存国粹。李保堂十分推崇创办《国粹学报》的邓实,认为“国学藉以保存,邓之功在一国”。他认为“搜遗补缺”、续修《射水芹香集》的司筠笙是“功在一邑”,保存了盐城的“国粹”,辛亥时从戎、思想开明的吴承烜,年老后也参加“国粹保存社”<sup>[14]</sup>。老年士绅文人的思想和人生成功都是基于旧学形成,其强大的惯性让他们在短时间无法转变。

#### (二)“脱去寒酸白喙歌”的中年士绅文人

中年士绅文人面对“世变之急,于古未有”的废科举,有如到了一个人生十字路口,对新情势如何因应,持旧学还是改新学?是争取清廷最后几个“优拔”出身,还是转事其他?他们既留恋旧世

界,又向往新生活,心理极为矛盾。虽知废科举是大势所趋,但依然很在乎自己的旧功名,强调“名公巨卿,豪志伟人,鲜有不出身科举者,”<sup>[9]</sup>然而,他们知道等级身份已没有存在基础,也无法以科举求入仕,只有从心理上积极因应现实。清末盐城社会出现的一些新职业,也给他们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机会。辛亥前后各地政权很不稳定,做官风险很大,在外地做官、颇有积蓄的盐城官员,也趁此机会还乡做点实事。对意图以科举入仕途的人来讲,在盐城找份新事做或转学新学,实比等着递补去做官容易。有功名的孙海南就是如此,1905年他到南京半年未获一差,1907年“省内开设法政学堂,分官绅两班,官班毕业后即委差缺”,孙海南先后入“宪政研究所、法政学堂”<sup>[15]</sup>。毕业后于1911年初出掌浙江湖州乌镇厘局,未几又兼署同知,9月辛亥革命波及到浙江,孙海南因涉及为保存公款,未捐款助革命而入狱。出狱后孙氏心灰意冷返乡,热心义举,创办海南义庄定静院,设立育婴堂,在故里创办盐城小学和中学。孙海南此例说明清末盐城士绅的新抉择,为他们的人生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清末民初,政府控制力减弱,底层社会空间增大,中年士绅逐渐成为盐城地方变革的引领者。士绅陶鸿庆、赵凤翔等人于清末开设开化书局,经营学校教科书等文化用品;陆凤歧与田省三、田韵悟等人于1921年开设同文书馆,代送上海各报纸,并寄往乡镇订户,这些举动给封闭的盐城社会带来了一缕新风。自1904年淮安岁考盐籍第一名的陈丹书热心创办新学开始,至民初,士绅一直是基层新学的主要倡导者与承办者。此外,中年士绅还积极参与地方自治等事务。士绅廖鸿仪感慨于新旧时代的变迁,于1914年冬写下《感怀》<sup>[12]</sup>八首,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盐城中年士绅对世局的看法。

#### (三)创办新学、投笔从戎的年轻士绅文人

相较于老年、中年士绅,年轻士绅文人是最没有历史包袱的一个阶层,他们适应新的社会潮流最为从容,对前途选择可以多元化。在当时逐步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获得了比父祖辈同一时期更多的人生机会,也是当时盐城社会变革中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群体。

具体来讲,盐城县年轻士绅文人较为成功的命运前途一般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比较保守和渐进的选择,只是为求

饭碗,到朝廷举办新学场所继续学业。如廖鹏程在 1904 年“岁试取人邑庠生”,“科举初停”后人江宁的“法官养成所”,1912 年该所改名为“江苏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廖鹏程“亦入焉”,法律本科肄业后“奉司法部令充律师候选高等文官。”<sup>[12]</sup>

第二种是出身旧学,但热心新学,在本乡办刊物、创新校,参加各级议会。创办新式教育的有士绅陈丹书、胡启东等。他们不仅办学,而且热心社会事业,胡启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张逸笙,他早就立志新学,1909 年被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和省临时议会议员。1912 年与刘启佑等创办《同声社》杂志,议论时事,宣传新思想。民国时继任江苏省参议会第一科长、省议会秘书长等职。胡启东、张逸笙等成为盐城县主张变革、思想开明的新绅士派系“西南党”的开创者和中坚人物。

第三种是有旧功名,废科举后,再入新式学校学习,毕业后回乡办理教育,开化地方。如光绪秀才宋泽夫“目击满清腐败,外患频仍,乃蓄有革新之志。1906 年入南京宁属师范,钻研新学”。师范毕业后,回乡办学,宣传革新,提倡剪辫发,反对缠足,鼓吹民权,组织自治会。考入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李卓哉毕业后回乡办学,1916 年在家乡创办李社高等小学,启蒙诸生,成绩斐然,遐迩闻名,被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誉之为“江北模范小学”<sup>[16]</sup>。伍佑镇时人称“大书橱”的陈黛生“舌耕一生”,提倡新学,桃李满门,其秀才门生孙汉三、智贞益受其影响,废科举后均考入两江师范,毕业回乡后,孙汉三曾任盐城劝学所所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和商业补习学校校长;智贞益则在“兴安会馆”讲学,团结进步人士,是辛亥时伍佑光复的发起人之一。这批新旧兼学的年轻士绅文人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盐城有影响的人士,影响着盐城各个领域的变革与发展。

第四种是到外乡外省去发展。部分士绅文人加入革命党,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如参加过科考的刘泽夫,因觉国家内忧外患,愤而改名刘天恨,居乡习武,并于 1904 年赴苏州从戎,后受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出任江北讨袁军总司令,时年 24 岁。另一部分士绅则在外地接受新学后留在外地发展。如盐城城厢的印水心,1907 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09 年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校理,《神州日报》、《民权报》、《新闻报》主笔及上海广学会编辑。他 1919 年编写了

作为盐城中学教材的《盐城县乡土地理》和《盐城县乡土历史》,深得教育界的好评。

#### (四) 转型失败、寄托鬼神的失意士绅文人

当然,在废科举、改国体之时,并非所有的年轻士绅文人的转型都能够如宋泽夫等人一样成功。如晚清盐城最有势力大家族金、王、陶、张四家,他们原先都是通过读书做官或者经商兴家的。四家的年轻子弟在废科举,创学堂后,虽知道“士不经商一世穷”,但他们既不经商,也不读书,依靠先人余荫,每天集中在名中医阮家,起名叫“正是堂”,终日闲谈,言不及义,消磨岁月。笔者以为,他们混日子的原因除了自身不努力,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小人物、小地方的固有状态”,他们习惯了数百年来一贯的悠闲旧式生活;其二是“转型期丧失目标的空白状态”,科举被废后,衣食无虞的读书求仕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他们的思维一下子出现空白,不知道是否应该从事新学,又抱着“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逐渐失去生活目标、无所事事。

辛亥革命后,新旧交替,社会失去权威和重心,处于变化中的无序状态,致使一些文人人生失意、生活迷失,他们终日感到前途茫茫,心绪不安,思想意识上寄托于神鬼仙佛,认为民国不会长久,有前清必有后清。开始从事迷信、帮会等活动。民国初期(1913 年左右),由盐城失意文人唐光先发起扶乩,并聚合一帮科举未成的游荡青年,如薛文波、瞿崇基等人,成立了迷信组织“同善社”,又称“仁济堂”,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制造迷信,骗取钱财。为了方便,1918 年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盐城分会”,常在中饱私囊之余还搞一些“仁义”之举应急救灾,装潢自己。同善社在宣传迷信,大量敛财的同时还为政治复辟做准备,举办盐城国学专修馆预修班,收学生 60 多人,教以“四书五经”,他们要求各道友的子弟不进洋学堂,认为将来还要复辟封建,开科取士。

同善社的出现表明,一方面表明盐城虽经历过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但民间传统的价值观念、迷信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未能跟上时代步伐的失意文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阻碍作用,这是盐城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过渡性特征在士绅文人身上的具体写照。

综上所述,1905 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恰如罗尔兹教授所述,随着曾经是“传统中国的社

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科举制度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sup>[17]</sup>,这进一步疏离了整个士绅阶层与清廷间的关系。对废科举后身处基层社会化的盐城文人士绅命运的研究,表明了随着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他们大都能根据当时自身不同的人生境遇,因应时势,弃旧

扬新,重新做出了纷繁复杂的人生选择。

清廷冀图于废科举后培养出新的力量,给衰败的王朝注入最后一点活力,而事实是此后培养出来的新学人才,却往往变为了清廷自身的掘墓者,他们在敲响了老朽清廷灭亡的钟声后,转身成为生机勃勃的新生民国的建设者!

#### 参考文献:

- [1] 陈玉澍. 后乐堂文钞—惩洋镇施棺记[M]. 上海图书馆藏,卷八.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899:13.
- [2] 张森材,马踪. 江苏区域文化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5.
- [3] [民国]林懿均修,胡应庚,陈钟凡. 续修盐城县志. 卷十[M].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36:3.
- [4] 朱涛. 画葫芦馆录存[M]. 盐城图书馆藏,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887:31.
- [5] 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委会. 盐城县志——大事记[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206.
- [6] 王先明. 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16.
- [7] 陈玉澍. 恭跋经济特科,《后乐堂文钞续编·卷六》[M]. 南京图书馆藏,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01:22.
- [8] 赵毅庵. 续修射水芹香集[M]. 盐城图书馆藏,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36:61.
- [9] 孙海南. 诫子书[Z]. 盐城市图书馆藏,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不详].
- [10] 陈玉澍. 教育自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08:1-2.
- [11] 郭介梅. 务本丛谈[Z]. 上海:大中书局,1930:62.
- [12] 廖鸿仪. 盐城廖氏宗谱·卷六[Z]. 上海图书馆家谱馆藏JP3,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不详].
- [13] 李保堂. 续修射水芹香集序[Z]//徐燧撰,陶性坚校订.《射水芹香集》,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15:78.
- [14] 南京师范大学故献整理研究所. 江苏艺文志·盐城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43.
- [15] 孙海南等. 盐城孙氏宗谱·宦海风波记[M].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23:28.
- [16] 柏群桂,蔡长青. 伍佑知名人士简介[M]//贾逵. 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183-184.
- [17] 吉尔伯特·罗尔兹. 中国的现代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335.

## History Restored: A Research to the Destiny of Poets and Literary Men in Ancient Yancheng during the Period of Abolish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

ZHOU Zi-zheng, ZHOU Yu-qi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Yancheng Library, Jiangsu Yancheng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1905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measures taken by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tried to look into the poets and literary men in ancient Yancheng, the changes of their destiny and thoughts before and after the abolished imperial examinations. Some of them were obstinate, some of them began to relearn or went to the road towards the revolution in life. Th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Yancheng socie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Min'guo was vividly displayed.

**Keywords:** Yancheng; poets and literary men;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dvocating new literary; local reform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